

【农民问题】

# 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问题化： 形成机制与调适策略

——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

李永萍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杨凌 712100)

**摘 要:** 隔代抚育是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的重要功能。有研究表明 ,隔代抚育并未给第一代留守儿童带来突出问题 ,而到了第二代留守儿童时 ,隔代抚育问题化已成为一个社会共识。可见 ,隔代抚育经历了一个问题化的过程。隔代抚育的问题化主要表现为祖代对孙代的管教能力不足、管教权威有限、管教意愿不强和管教方法落后。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分析隔代抚育问题化的形成机制 ,发现隔代抚育的问题化并非仅隔代抚育模式本身的问题 ,而是家庭权力结构变化、学校教育公共性弱化、家庭抚育的去社区化、互联网时代育儿环境复杂化等因素共同塑造的产物。“亲代陪读”是农民家庭应对隔代抚育问题化的一种方式 ,但“亲代陪读”意味着抚育和教育压力向家庭进一步集聚 ,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农民家庭的抚育困境。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决定了隔代抚育模式在中国农村还将持续存在一段时间 ,为此要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区、国家等主体的共同力量 ,坚持系统思维 ,尽可能减少隔代抚育的负面效应 ,使农村儿童在隔代抚育模式下仍然能够健康成长。

**关键词:** 隔代抚育; 留守儿童; 社会系统; 教育主体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7465( 2024) 05-0097-11

DOI:10.19714/j.cnki.1671-7465.2024.0064

进入 21 世纪 ,随着打工潮扩散 ,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速率和规模迅速增加 ,这在增加农民家庭收入的同时也对家庭抚育功能形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 ,隔代抚育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 ,引起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 ,回溯农民城乡流动的变迁过程 ,隔代抚育并非必然给孙代成长带来突出问题 ,留守儿童与父母空间分离的教育缺憾可通过其成长的制度环境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而在近年来的研究中 ,学界越来越多地注意到隔代抚育给儿童成长带来的诸多问题 ,可见 ,隔代抚育经历了一个问题化的过程。本研究将结合实地调研经验 ,探讨隔代抚育问题化是如何产生的 ,问题化了的隔代抚育又如何影响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理解了隔代抚育问题化的发生逻辑 ,才能在政策层面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 (一) 文献梳理

抚育是家庭的核心功能<sup>[1]</sup>。但家庭内部由谁来承担主要育儿责任 ,则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制度结构、家庭策略等息息相关。学界围绕家庭内部的育儿主体和育儿分工展开了诸多

收稿日期: 2023-04-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研究”( 21CSH030)

作者简介: 李永萍 ,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研究,并主要聚焦于两个角度,即家庭育儿中的性别分工和代际分工。在性别分工方面,当前城乡家庭儿童照料呈现明显的女性化特征,母亲是儿童照料的主体,新生代母亲“丧偶式育儿”成为常态<sup>[2]</sup>。学者们围绕“母职惩罚”<sup>[3]</sup>、“母职焦虑”<sup>[4]</sup>、“母职形象”<sup>[5]</sup>等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农民家庭育儿模式发生变化,祖代越来越多地参与孙辈抚育过程,家庭育儿中的代际分工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总体来看,学界关于家庭育儿的代际分工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老漂”家庭的代际合作育儿。“老漂”家庭主要是指农村中老年父母为了减轻在城市工作的子代负担,从农村阶段性流动到城市帮助子代照顾小孩和料理家务。代际合作育儿是“老漂”家庭主要的育儿模式<sup>[6]</sup>。代际合作育儿中的角色分工呈现“严母慈祖”<sup>[7]</sup>的特征,年轻母亲是育儿“总管”,祖代则是“帮助者”或“保姆”的角色<sup>[8]</sup>,祖辈在育儿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和决策权<sup>[9]</sup>。代际合作育儿中的权力关系呈现“台前幕后”<sup>[10]</sup>的特征,即父辈“台前”(强权力),祖辈“幕后”(弱权力)。当两代人在育儿方面出现冲突时,年轻父辈的“科学育儿”观念通常战胜祖辈的“经验育儿”观念<sup>[11]</sup>。代际合作育儿中“父辈主导、祖辈边缘”的权力格局以亲密关系为前提,年轻母亲在育儿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是祖辈主动让渡的结果<sup>[12]</sup>。增强代际的育儿知识交流,有利于推动代际合作育儿的良性互动,减少代际育儿冲突<sup>[13]</sup>。

第二,农村留守家庭的隔代抚育。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抚育占比较大,且处于隔代监护下的留守儿童问题较多<sup>[14]</sup>。具体来看,关于农村留守儿童隔代抚育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隔代抚育对儿童成长的影响。隔代教育对孙代的行为习惯、学习成绩、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可能带来负面影响<sup>[15]</sup>。隔代抚育的留守儿童往往被视为“问题儿童”或“弱势儿童”<sup>[16]</sup>。祖代的溺爱倾向容易造成孙代在性格和行为习惯方面形成骄纵和任性等特点<sup>[17]</sup>。由于亲子监护的缺失和隔代监护的不足,留守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缺乏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容易出现失范行为<sup>[18]</sup>。二是隔代抚育对祖代的影响。照料孙代虽可能给祖代带来身心负担<sup>[19]</sup>,但也有利于提升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sup>[20]</sup>。其中,隔代抚育对非流动老人的正面影响大于流动老人,这是因为流动老人在照料孙代的过程中还需要面临社交不足和社会融入困难等问题<sup>[21]</sup>。三是隔代抚育的形成原因。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育儿模式并非家庭的个体化选择,而是一套制度性安排<sup>[22]</sup>。我国在转型期的隔代抚育模式被视为家庭保障制度不足、劳动就业制度不尽完善、义务教育被过度产业化等制度安排缺失的结果<sup>[23]</sup>。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也是导致留守儿童隔代抚育的重要原因,留守儿童隔代抚育现象是城市化不彻底的产物<sup>[24]</sup>,是“现代化发展之殇”<sup>[25]</sup>。从代际交换的视角来看,隔代抚育既可能强化子代未来赡养老年父母的预期<sup>[26]</sup>,也使祖代在照料孙代过程中获得情感支撑和价值感<sup>[27]</sup>。从家庭策略的视角来看,隔代抚育是打工经济背景下农民家庭做出的理性家庭决策,有利于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市场化和家庭资源积累能力最大化<sup>[28]</sup>。

既有研究丰富了对于转型期农村家庭隔代抚育模式的认识,且在隔代抚育问题化这一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在“儿童中心主义”的背景下,研究者尤其关注隔代抚育模式对儿童成长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既有研究的不足在于,研究者大多将隔代抚育问题化视为一个既定事实,缺乏对这一既定事实本身的深度剖析。也就是说,学界对于“隔代抚育问题化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缺乏深入研究。

## (二) 研究思路: 社会系统论视野下的隔代抚育问题化

隔代抚育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传统农业社会,祖代通常就会和子代一起分担育儿责任,以缓解年轻子代初为父母的育儿压力。根据祖代承担育儿责任的大小,可以将隔代抚育区分为祖代参与抚育孙代和祖代完全抚育孙代两种类型。本文主要探讨后一种类型,即父

母双方均长期在城市务工、由祖代(主要是爷爷奶奶)承担主要育儿责任的情况。在我国农村地区,由祖代承担主要照料责任的隔代抚育是伴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而出现的。自20世纪80年代打工经济兴起以来,我国农民工经历了代际更替,即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转变为第二代农民工(主要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伴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儿童也从第一代留守儿童(主要为80后和90后)转变为第二代留守儿童(主要为00后)。根据学界相关研究以及笔者在多地农村的田野调研来看,隔代抚育并未给第一代留守儿童带来突出问题,而到了第二代留守儿童时,隔代抚育问题化已成为一个社会共识,隔代抚育的儿童被认为面临更多问题和困境,且可能成为“问题儿童”。

可见,隔代抚育问题化并非由来已久,而是近年来才开始成为一个问题。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与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阶段相比,当前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村庄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很大变化,导致留守儿童出现一些新问题和新困境<sup>[25]</sup>。儿童抚育并非仅家庭的责任,家庭、学校、社区等都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教育主体。因此,本研究主要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分析隔代抚育问题化的形成机制,将儿童抚育放置到由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多元主体构成的社会系统中,分析社会系统的变迁如何导致隔代抚育的问题化。在社会系统论视野下,隔代抚育的问题化并不仅祖代教养不足或管教方法无效的问题,而且与育儿环境的整体变化有关。因此,社会系统论的视角有助于进一步廓清隔代抚育问题化的根源,避免隔代抚育的污名化。具体而言,本文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隔代抚育问题化的表现;二是隔代抚育何以成为一个问题,即隔代抚育问题化的形成机制;三是隔代抚育问题化的应对之策。

本文是一项质性研究,经验启示来源于笔者近年来在中西部多地农村的田野调研。为了方便表述,文中使用资料主要来自笔者2021年3月在贵州C村和2021年7月在安徽Y村的调研。本研究主要以村庄作为田野调查单位,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在理解乡村社会系统整体变迁的基础上定位隔代抚育的经验现象。访谈对象包括普通农民、村庄经济精英、村干部等,覆盖不同年龄的群体,以尽可能对农民家庭抚育模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认知。调研采取上午和下午访谈、晚上小组研讨的模式,以深化对经验资料的挖掘。

## 二、隔代抚育问题化的表现与后果

隔代抚育模式是伴随着打工经济兴起而产生的,且被认为是农民家庭最为合理的一种家庭分工模式。在隔代抚育模式下,农民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可以充分参与市场,从市场中获取更多现金收入;而祖代在农村以务农和照料孙代为主,其务农收入可以基本满足祖孙两代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如此一来,农民家庭就可以同时获得务农和务工两部分收入。如果祖代不能帮助抚育孙代,那么年轻夫妻将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将子女一起带到打工地抚育,要么夫妻一方留守在家照料小孩。无论哪一种选择,都将弱化家庭的整体资源积累能力。可见,从家庭资源积累的角度来看,隔代抚育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优势,有助于提升家庭整体的竞争力,实现家庭更好的发展和流动。然而,近年来隔代抚育的弊端也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隔代抚育的儿童往往被等同于“问题儿童”。结合笔者在多地农村的田野调研经验,当前农村家庭隔代抚育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祖代对孙代的管教意愿不足,过分溺爱孙代。“隔代亲”在中国家庭文化传统中是一个普遍现象,祖代通常都比较溺爱孙代,这不仅表现为对孙代提出的要求都尽可能满足,而

且表现为在孙代犯错误时也舍不得打骂。当父代和祖代共同育儿时,父代的及时干预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祖代溺爱对孙代成长的不利影响。但隔代抚育家庭通常是“拆分型家庭模式”<sup>[22]</sup>,年轻的父代常年在外出务工,因此不能对祖代的溺爱行为及时干预。此外,当前农民家庭少子化也进一步强化了祖代对孙代的溺爱,80后和90后年轻夫妻通常都只有1个或2个小孩,祖代对孙代更为宠爱。皖南Y村一位隔代抚育家庭的爷爷说,“(对孙子)轻打轻骂不管用、重打重骂舍不得”。(FRJ,20210712)实际上,大部分隔代抚育的祖代对孙代的日常生活照料都没问题,但对孙代的日常行为管教却严重不足,对孙代的过错行为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缺乏有效引导和及时纠正。祖代的无限度溺爱不仅容易养成孙代的骄纵性格,还可能使小错酿成大错。

第二,祖代对孙代的管教能力欠缺。这主要表现为祖代对孙代的学业辅导能力有限。对于大部分隔代抚育的祖代而言,他们在饮食起居方面可以无微不至地照料孙代,但在学业辅导方面却无能为力。在田野调研中,很多祖代都向笔者抱怨,“(学业上)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PYT,20210320)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农村的祖代知识水平有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前中小学生的学业难度增加、学业要求更高,尤其是很多课后作业都需要学生在手机或电脑上完成,而祖代通常对手机和电脑操作不太熟悉。因此,在农村隔代抚育家庭中,孙代的学业基本完全要靠小孩自觉完成,祖代至多起到监督作用。

第三,祖代对孙代的管教权威弱化。祖代对孙代的有效管教建立在一定的教育权威基础之上。然而,在转型期的乡村社会中,祖代对孙代的管教权威越来越弱。一方面,农村祖代自身的知识结构有限,且知识结构比较老化,对现代社会很多新鲜事物都缺乏了解和认知,不仅使得祖代难以对孙代有效施教,而且也无法在孙代面前获得管教权威<sup>[29]</sup>。例如,在手机和互联网使用中,孙代大多比祖代操作熟练,很多祖代甚至不得不“求教”于孙代。另一方面,随着儿童在家庭中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家庭内部呈现“儿童中心主义”的特点,很多祖代心甘情愿舍去权威,无限度宠溺孙代。在祖代教育权威逐渐弱化的背景下,隔代教育的效果自然就大打折扣。

第四,祖代对孙代的管教方法落后,祖孙两代人难以实现有效沟通和交流。隔代抚育家庭中祖代的年龄通常在五六十岁以上,他们在教育孙代的过程中喜欢“说教”的方式,这容易引起孙代的反感和逆反。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儿童接触各种知识比较早,且接触的知识面比较广,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儿童而言,当前的儿童普遍比较早熟。早熟的儿童有了更多思考能力,他们期待和父代或祖代平等的交流,当祖代以“过来人”的身份说教时,孙代容易滋生厌恶情绪,进而使得祖孙两代人之间缺乏实质性的交流。在田野调研中,很多爷爷奶奶都抱怨,“现在的小孩不好管,一说他就顶嘴”。(PYT,20210320)而孙代则抱怨爷爷奶奶,“只知道说教,不懂沟通”。(YMY,20210327)

可见,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隔代抚育确实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隔代抚育的问题化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首先,在学业方面,由于祖代辅导能力欠缺,隔代抚育儿童从家庭中获得的学业辅导较少,很多儿童缺乏学习自觉性,无法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在当前学生学业任务需要家庭更多参与和辅导的情况下,隔代抚育儿童的成绩直接受到影响,一些儿童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和逃学行为。其次,在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方面,由于缺乏有效引导和及时监管,隔代抚育的儿童容易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严重者甚至会出现一些失范行为。例如,2021年3月笔者在黔东C村调研时,发现当地的早婚现象很普遍,而留守儿童长大后早婚的比例更大,由于祖代疏于管教,留守儿童极易与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混在一起,进而产生早恋、早孕和早婚。最后,在心理上容易产生极端思想。由于长期得不到父代的关爱,而

与祖代之间又缺乏实质性的情感交流,一些留守儿童在思想上容易走极端,认为家人都不关心自己。例如,2021年7月笔者在皖南Y村调研了解到一个案例:一位上小学四年级的留守儿童离家出走,原因是生病的前几天没有得到父母和祖父母及时的关爱。

### 三、社会系统变迁与育儿环境变化:隔代抚育问题化的形成逻辑

隔代抚育问题化并非仅“隔代抚育”本身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系统变迁带来的育儿环境变化息息相关。育儿是家庭的重要功能,但家庭并非育儿的唯一主体。在乡村社会中,儿童抚育是由家庭、学校和社会(包括现实的村庄熟人社会和虚拟网络社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家庭、学校、村庄社区以及社会环境等构成农民家庭育儿的“社会系统”,隔代抚育问题化的根源就在于上述社会系统变迁导致隔代抚育面临更为复杂的育儿环境。本节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从家庭权力结构变化、学校教育公共性弱化、家庭教育的去社区化、网络社会育儿环境复杂化等四个方面分析隔代抚育问题化的形成逻辑。

#### (一) 家庭权力结构变化与祖代管教权力收缩

隔代抚育问题化的表现之一是祖代容易溺爱孙代,孙代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有效引导和监管,进而影响其健康成长。随着乡村社会变迁和农民家庭变化,祖代对孙代的溺爱有增无减,很多隔代抚育家庭的祖代对孙代已经到了“纵容”的地步。祖代对孙代的溺爱,一方面是源于对孙代的爱而“舍不得打”,即所谓的“隔代亲”;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而“不敢打”,年轻父代主导的家庭权力结构压缩了祖代对孙代的管教空间和管教权力,进而使得祖代对孙代的管教比较松懈。

有效的隔代抚育建立在祖代对孙代具有较大管教权和管教自主性的基础之上。祖代对孙代的管教权是家庭权力结构的一个面向。一般来说,当家庭权力是由老年人(即家庭中的祖代)主导时,祖代对孙代的管教权较强、管教空间较大;反之,当家庭权力是由年轻人(即家庭中的父代)主导时,祖代对孙代的管教权较弱、管教空间较小。在当前农民家庭权力结构中,年轻人(尤其是儿媳妇)通常占据主导性地位,作为祖代的老年人通常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此情况下,隔代抚育家庭中的祖代虽然承担了照料孙代的主要责任,但他们并不具有自主管教孙代的权力,即使年轻父代赋予祖代以管教权,大部分祖代也不会真正践行,他们在孙代面前大多扮演“慈祖”的形象。可见,祖代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地位使得其不敢真正严格管教孙代,一方面,他们担心对孙代管教过于严格会使儿子和儿媳妇心里不高兴,另一方面,祖代对孙代的宽容与溺爱实际上也是其讨好儿子和儿媳妇的一种方式。在祖代看来,他们现在对孙代足够好,以后儿子和儿媳妇才可能对自己好。2021年笔者在皖南Y村调研时访谈了很多隔代抚育家庭的爷爷奶奶,受访者大多表达了平常不敢随意打骂孙代。Y村一位70岁的老年人说:“爷爷奶奶一般都不会打小孩,爷爷奶奶和爸妈不一样,不好重打重骂。轻轻打,不管用,打重了,又怕父母不高兴。万一小孩打电话给父母,说爷爷奶奶打自己,爷爷奶奶就担心儿子媳妇心里不高兴。”(FRJ,20210712)

实际上,大部分年轻父代并不会怪罪祖代打骂小孩,很多年轻父代还会专门给祖代强调要对小孩严加管教。但是,祖代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使其仍然不敢对孙代过于严格,担心自己对孙代过于严格之后会引起儿子和儿媳妇的不满,进而造成家庭关系不和谐。可见,在家庭权力由年轻人主导的背景下,大部分隔代抚育家庭的祖代对孙代的管教权较弱,管教空间不足。祖代在孙代管教上要考虑儿子和儿媳妇的想法和态度,使得其在孙代管教方面比较畏首畏尾。为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家庭矛盾,很多隔代抚育家庭中的祖代实际上已经

放弃了对孙代的管教权,宠溺孙代成为常态。

### (二) 学校教育公共性弱化与教育压力转移

祖代对孙代的学业辅导能力有限是当前农村隔代抚育面临的一大难题。然而,隔代抚育在孙代学业教育上的困境并非由来已久,而是伴随着学校教育公共性弱化而产生的。有学者针对第一代留守儿童学业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习成绩和学习兴趣上并没有显著差异<sup>[30-31]</sup>。然而,近年来笔者在农村调研发现,第二代留守儿童在学业成绩上普遍落后于非留守儿童,隔代抚育在儿童教育上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实际上,第一代留守儿童在学业上与非留守儿童之所以没有显著差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一时期农村家庭对子女的学业辅导能力和辅导意愿普遍较低,无论是亲代抚育还是隔代抚育对儿童的学习成绩影响都不大;二是这一时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公共性比较强,学校承担了主要的学业教育责任,农民家庭在子女学业教育上不需要投入过多精力。近年来,随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公共性逐渐弱化,教育责任更多向家庭转移,农民家庭需要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从而强化了家庭教育对子女学业影响的重要性,凸显了隔代抚育的弊端。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公共性弱化,主要源自近年来教育改革弱化了学校的教育功能,由此强化了家庭的教育责任和教育压力。具体来看,当前学校教育公共性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教育压力强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家庭需要更多参与具体的学业辅导。当前小学生的很多家庭作业需要在家长的辅导下才能有效完成,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业难度较高且要求较细,很多学生无法独立完成,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课后作业要求在电子设备(如手机、电脑)上完成。大部分祖代的知识水平有限,且对于现代电子设备操作不熟练,因此他们对孙代的学业辅导能力有限,很多时候只能任由孙代自行完成。第二,学生在校时间缩短,使得家庭在儿童教育上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近年来随着减负政策话语的兴起,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大为缩短,尤其是小学低年级学生通常在下午三点半左右放学,放学之后大量的时间如何监管对于家庭而言也是一个问题<sup>①</sup>。一些祖代任由孙代自由支配放学后的时间,对孙代的娱乐时间和娱乐内容缺乏有效监管和引导,由此可能导致儿童沉迷于手机、网络等,进而影响其学业。可见,在学校教育公共性弱化的背景下,农民家庭需要承担更多的教育责任,亲代抚育与隔代抚育开始呈现显著差异,隔代抚育的问题愈益突出。

### (三) 家庭抚育的去社区化与私人化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村庄熟人社会构成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在儿童抚育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农村学龄儿童(除了学校)的大部分时间在村庄中度过,因此村庄作为一个整体对儿童的道德品行和行为习惯塑造至关重要。村庄这一主体在儿童抚育中的作用大小主要取决于村庄公共性的强弱,一般而言,村庄公共性越强,其在儿童抚育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大,村庄公共性越弱,其在儿童抚育中发挥的作用越小。传统乡土社会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其对儿童教育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村民可以介入其他家庭的子女教育,尤其是当一些小孩出现不良行为时,村庄中的长辈可以及时管教;其二,村庄公共规则和舆论压力使得农民家庭必须重视子女教育问题,如果小孩行为习惯不好,作为监护人的祖代或亲代将面临很大的舆论压力。可见,当村庄公共性较强时,育儿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事,而且整个村庄社会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教育的不足。

然而,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乡土社会逐渐空心化,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逐渐解

<sup>①</sup> 2021年以来,教育部要求各地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课后延时服务”,但目前这一政策主要是在部分城市试点,大部分农村地区学校还没有开始实行“课后延时服务”。

体,村庄公共性渐趋弱化。“不管闲事”和“不得罪人”成为大部分村民的处世之道。村庄社会逐渐从其他家庭的儿童教育中退出,儿童抚育成为农民家庭的私事。一方面,村民不愿意再插手其他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即使看到一些小孩行为习惯不好,也不会及时制止和管教,以免被认为多管闲事;另一方面,对小孩管教不好的家庭也不再面临村庄社会的舆论压力,这就导致父母或祖父母不能及时意识到自己在小孩教育上的问题或错误,进而不能及时改进自己的教育方法或强化管教力度。可见,村庄公共性弱化对儿童抚育的直接后果是家庭抚育的去社区化和私人化。村庄社会从家庭育儿中的退场极大地改变了儿童的成长环境,即强化了对家庭和学校的依赖。当家庭中的祖代疏于管教、学校公共性渐趋弱化时,隔代抚育的问题进一步凸显。

#### (四) 互联网时代儿童成长环境的复杂化

与第一代留守儿童相比,第二代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互联网时代各种网络游戏、短视频等充斥于儿童的日常生活。手机、互联网的兴起不仅改变了儿童的娱乐生活,占据儿童大量的时间,而且进一步增加了隔代抚育的困难。学界主要从结构和行动两个视角探讨留守儿童沉溺网络游戏的原因,“结构”主要是指留守儿童面临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教育功能失调,而“行动”则是指留守儿童自身对网络游戏的自制力有限<sup>[32]</sup>。结合农村儿童成长环境的特点及其变化,笔者认为农村儿童普遍沉溺于网络游戏与以下三方面因素相关:第一,村庄公共娱乐生活匮乏。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公共娱乐越来越少,儿童从村庄社会中难以获得合适的娱乐方式。第二,学校娱乐时间和娱乐内容受限。随着对学生的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安全问题一票否决”增加了学校管理者的压力,因此大部分中小学都尽量减少学生在校的娱乐时间,例如,很多学校都不再举办运动会、艺术节,甚至一些学校连体育课都不敢正常开设。第三,家庭少子化导致儿童玩伴较少。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山区农村,村民之间居住比较分散,大部分儿童都只能在家里独自娱乐。在娱乐空间不足、娱乐方式有限且玩伴较少的情况下,农村儿童逐渐依赖手机和网络游戏打发时间。

总体来看,隔代抚育家庭的留守儿童对手机和网络游戏普遍更为沉迷。很多隔代抚育家庭的儿童在放学回家之后就一直与手机为伴,祖代对此既“管不了”,也“不想管”,从而导致很多儿童过度沉迷于手机和网络游戏。一方面,农村家庭的祖代对手机和网络都不是很熟悉,很难及时发现孙代对游戏的沉迷。在田野调研中,有年轻父母向笔者抱怨,“爷爷奶奶不懂手机游戏,小孩在他旁边打游戏他也不知道,还以为小孩是在手机上做作业”。(WQH, 20210722)另一方面,隔代抚育家庭的祖代对孙代的娱乐时间和娱乐内容缺乏有效监管,孙代容易因自律性不足而过度沉迷游戏难以自拔。可见,互联网时代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祖代与孙代之间的“代沟”,祖代既有的知识系统已经不足以应对孙辈抚育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一些祖代意识到自己知识能力的欠缺,在孙代抚育过程中主动让权,减少对孙代日常行为的监管,如此更容易使孙代陷入网络世界的泥淖。

#### (五) 隔代抚育问题的系统生成

抚育从来不只是家庭的责任。尤其是在通往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家庭的部分功能外移,而家庭再生产深深地卷入社会系统。隔代抚育本是农民家庭为了兼顾家庭资源积累和子代抚育而形成的一种折中方案,其有效性依赖于村庄、学校乃至社会环境的系统性支持。在这个整体的社会系统中,隔代抚育虽然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却可以依靠学校、村庄的及时介入来缓解和消化。然而,中国社会的持续变迁推动了上述社会系统的重组,重置了隔代抚育的运作情境。以上分别从家庭、学校、村庄社会和互联网环境等四个维度分析了隔代抚育问题化的形成逻辑。上述分析表明,隔代抚育的问题化并非仅“隔代抚育”模式的问题,而是整

个育儿社会系统的变迁所致。家庭权力结构变化、学校公共性弱化、村庄社会公共性弱化以及互联网时代社会环境复杂化,都进一步凸显和强化了家庭这一主体在儿童抚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农民家庭既要通过代际分工应对现代性的压力,又不得不正视这一分工模式对于子代抚育产生的负面效应。可见,家庭承载的压力进一步增加,家庭抚育模式的选择对于子代的成长重要性日益凸显。

#### 四、“亲代陪读”:隔代抚育问题化的调适策略

随着隔代抚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农民家庭逐渐开始调整育儿模式,其中,“亲代陪读”是农民家庭应对隔代抚育问题化的一种方式。近年来,笔者在农村调研发现“亲代陪读”现象越来越普遍,即由年轻母亲阶段性回乡照料子女,年轻父亲仍然以在大城市务工为主。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大部分年轻母亲选择在乡镇或县城陪读。相对于隔代抚育而言,“亲代陪读”在子女教育上的资源投入和时间投入都更高。农民家庭选择“亲代陪读”,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减少隔代抚育对小孩成长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年轻父母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当前乡村社会中选择“亲代陪读”的主要有两种家庭:一种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另一种是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的家庭,父母期待通过对子女教育的高投入实现家庭发展和阶层流动。此外,乡村社会中也有一部分陪读家庭是“随大流”。

“亲代陪读”是在隔代抚育问题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对育儿模式的主动调适。“亲代陪读”可以分为全职陪读和“半工半陪”两种类型。陪读母亲兼职打工以不影响其陪读为基本前提,因此她们一般会选择那些对上下班时间没有严格规定的小厂打零工。在一些陪读比较普遍的地区,乡镇或县城的中小学附近往往会出现很多小型工厂,其工人大部分是陪读妈妈。例如,2021年笔者调研的皖南Y镇和县城学校周边就有很多小型服装厂和箱包厂,这些工厂对工人没有严格的时间管理,采取计件制,陪读妈妈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随时上下班。在陪读家庭中,陪读妈妈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好子女的学习和生活,尽可能屏蔽一切对子女学习和成长不利的因素。因此,陪读家庭中子女的生活节奏几乎全部是由母亲安排,子女拥有较少的自由空间,这与隔代抚育家庭中祖代对孙代较为宽松的管教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相对于隔代抚育而言,“亲代陪读”之下陪读妈妈对子女的照料和管教更为精细、全面和严格,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精细化的生活照料。对于陪读妈妈而言,其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好子女的日常饮食起居,让子女可以心无旁骛地学习。在生活方面,陪读妈妈会变着花样给子女做各种美食。为了让子女节约更多时间用于学习,很多陪读妈妈每天早中晚都亲自接送子女上下学。第二,学业辅导。相对于祖代而言,年轻父母(主要为80后和90后)受教育水平更高,因此对子女的学业辅导能力更强,尤其是在小学低年级阶段,陪读母亲的及时辅导对子女学业成绩有显著影响。即使缺乏辅导能力,陪读母亲也会全程陪伴和监督子女完成课后作业。在田野调研中,很多陪读母亲都表示自己每天晚上都要陪子女写作业到很晚才休息,“孩子不休息,我也不休息”。(WP,20210717)第三,严格的时间监控。大部分陪读妈妈都为子女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并要求子女严格执行。例如,很多陪读妈妈都会计算好居住地到学校所需时间,以免子女在途中贪玩。第四,行为习惯教养。除了学业,陪读妈妈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重视对子女的品行规范和行为习惯教养。如果子女犯错误,陪读妈妈会严厉批评,让其意识到错误并及时改正。

可见,相对于隔代抚育而言,陪读母亲对于子女的管教能力、管教权威和管教意愿都更



强,且管教方法也更为多元。“亲代陪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隔代抚育对子女成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亲代陪读”也给农民家庭带来诸多新困境。首先,“亲代陪读”弱化了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陪读家庭需要安排一个劳动力陪伴子女上学,家庭内部少了一个壮劳力参与市场务工,这显然弱化了家庭从市场上获取资源的能力。同时,陪读母亲和孩子在乡镇或县城的开支也比较大,以笔者2021年在皖南Y镇的调研为例,当地一个陪读妈妈和孩子在县城陪读一年需要花费3万~4万元,在乡镇陪读一年也要花费2万元左右。其次,“亲代陪读”以牺牲年轻母亲为代价。“亲代陪读”改变了年轻母亲的生命历程,重塑了她们的生活世界,走出家庭的女性因为子女教育问题再一次被拉回家庭之中,年轻母亲在此过程中做出巨大牺牲。此外,“亲代陪读”还可能导致亲子关系紧张。陪读妈妈对子女的严格管教容易导致孩子的心理逆反,因此很容易产生亲子冲突,这不仅增加了陪读妈妈的精神压力,还可能影响孩子的学习生活。实际上,虽然母亲在管教小孩方面比爷爷奶奶更为严厉,但“亲代陪读”并非就能解决子女成长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如一些由母亲陪读的孩子仍然存在各种不良行为习惯问题,仍然可能沉迷于手机游戏。可见,“亲代陪读”并非解决当前农民家庭育儿难题的唯一法宝,在儿童成长的社会系统发生整体性变化的背景下,破解家庭的育儿困境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等主体的共同努力。

##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社会系统变迁的角度探讨隔代抚育问题化的形成逻辑。随着儿童成长的社会系统和育儿环境的变化,“隔代抚育”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祖代管教权的压缩、学校教育公共性弱化、家庭教育的去社区化、互联网时代育儿环境的复杂化等因素共同加剧了隔代抚育的困境。上述社会系统变化的一个共同指向是,进一步强化了家庭在育儿中的责任和核心作用,如此一来,家庭在育儿上的重视度和投入度成为影响儿童成长的重要因素。可见,隔代抚育在当前呈现的困境是家庭、学校、社区等儿童教育主体的系统变迁共同形塑而成。

为了应对隔代抚育的问题化,一些农民家庭选择由年轻母亲回乡陪读。但是,正如笔者前文所言,选择“亲代陪读”的家庭通常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或者父母比较重视教育的,并非每个农民家庭都有选择“亲代陪读”的条件。同时,亲代陪读也意味着抚育和教育等压力在家庭中的进一步集聚,农民家庭因而面临不堪承受之负担。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经济格局的区位分布,大部分农民家庭依然不得不维持着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隔代抚育这一现象在乡村社会中还将持续存在一段时间。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从家庭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隔代抚育是当前农民家庭比较理性的家庭策略选择。这种家庭抚育模式有利于充分释放家庭劳动力进入市场,实现家庭资源积累能力最大化,进而为家庭再生产和家庭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既然隔代抚育模式在一定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就需要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区、国家等主体的共同力量,坚持系统思维,从制度和政策上共同发力,尽可能减少隔代抚育的问题化,使农村儿童在隔代抚育模式下仍然能够健康成长。

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干预和应对:第一,父母要加强对隔代抚育留守儿童的关注,避免将抚育责任完全甩给祖代。应对隔代抚育中产生的问题,首先需要家庭自身的努力。外出务工的父母要经常与子女保持联系,了解和关心子女的学习生活状况,让子女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同时,外出务工的父母也要与学校老师积极沟通,协助老师共同教育子女。第二,强化学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将教育责任过度转移给家庭,建构相对均衡的家校关系。例如,学校可以适度延长隔代抚育的留守儿童在校的学习时间,给予他们更多的学业辅导。

第三,重建社区公共性。要充分发挥和激活基层组织的作用,在村庄中发掘和动员积极分子参与儿童的社区教育,营造积极向上和健康的成长环境。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社区的公共空间,让留守儿童有更多可以学习和娱乐的地方。第四,加强对互联网和游戏公司的监管,避免儿童过度沉溺于网络世界,减少互联网对儿童成长的负面影响。

#### 参考文献:

-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6-117.
- [2]徐依婷.“丧偶式育儿”:城市新生代母亲的母职困境及形成机制[J].宁夏社会科学,2020(6):136-143.
- [3]杨菊华.健全托幼服务推动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J].妇女研究论丛,2016(2):11-14.
- [4]金一虹,杨笛.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J].南京社会科学,2015(2):61-67.
- [5]沈奕斐.辣妈:个体化进程中母职与女权[J].南京社会科学,2014(2):69-77.
- [6]陈辉.老漂: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代际支持的新方式[J].中国青年研究,2018(2):24-29.
- [7]肖索未.“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社会学研究,2014,29(6):148-171.
- [8]沈奕斐.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312-318.
- [9]汪永涛.转型期城市家庭的代际合作育儿[J].社会学评论,2020,8(2):85-97.
- [10]王兆鑫.“台前幕后”:农村家庭儿童抚育过程中祖辈、父辈的职能分工和代际关系[J].社会建设,2020,7(2):54-65.
- [11]张杨波.代际冲突与合作——幼儿家庭照料类型探析[J].学术论坛,2018,41(5):125-133.
- [12]沈奕斐.“后父权制时代”的中国——城市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变迁与社会[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6):43-50.
- [13]李兴睿,冯剑侠.后喻文化语境下代际合作育儿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基于科学育儿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分析[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9(6):90-96.
- [14]叶敬忠,王伊欢.留守儿童的监护现状与特点[J].人口学刊,2006,28(3):55-59.
- [15]李宝峰.农村“留守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干预[J].教育探索,2005(5):82-83.
- [16]邬志辉,李静美.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1):65-74.
- [17]李根寿,廖运生.农村“留守子女”教育问题及对策思考[J].前沿,2005(12):163-165.
- [18]杨狄,刘征峰.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制度的虚置及其反射性改革[J].湖湘论坛,2018,31(4):112-123.
- [19]肖雅勤.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 CHARLS 的实证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7(1):33-39.
- [20]王伟同,陈琳.隔代抚养与中老年人生活质量[J].经济学动态,2019(10):79-92.
- [21]靳小怡,刘妍璐.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流动老人和非流动老人的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2):119-129.
- [22]谭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11(1):138-150.
- [23]徐友龙,周佳松,凌雁.“中国式隔代抚育”现象论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9(10):95-99.
- [24]凡勇昆,邬志辉,秦玉友.农村留守儿童研究的学理反思与可能生长点[J].教育发展研究,2016,32(20):47-51.
- [25]叶敬忠.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基本立场、认识误区与理论转向[J].人口研究,2019,43(2):21-31.
- [26]宋璐,冯雪.隔代抚养:以祖父母为视角的分析框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1):83-89.
- [27]郑佳然.代际交换:隔代抚养的实质与挑战[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1):113-119.
- [28]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137.
- [29]杨华.教育主体缺失视角下农村校园欺凌成因及治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

(6): 86-98.

[30] 吴霓.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J]. 教育研究, 2004, 25(10): 15-18.

[31] 朱科蓉, 李春景, 周淑琴. 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分析与建议[J]. 教育科学, 2002, 18(4): 21-24.

[32] 张明皓, 叶敬忠. 游戏商品化中的留守儿童[J]. 教育科学文摘, 2019(2): 53-55.

(责任编辑: 李凌)

## The Problem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in Rural Familie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Adjustment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ystems Theory

*Li Yongping*

**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care is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rural families in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generational separation did not lead to pronounced issues for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However, by the tim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the issue of generational separation has become a widely recognized social concern. This suggests that intergenerational care has undergone a problematic evolution. The challe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care are primarily evident in the form of inadequate capability, limited authority, low motivation, and outdated disciplinary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ystems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tional separation in parent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issue is not solely a problem with the “generational separation” model itself but is also a consequence of shifts in family power structures, the diminishing public role of school education,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amily parenting, and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parenting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net age. “Parental education” has emerged as a strategy for rural families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However, this approach further concentrates the pressures of parenting and education on the family,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undamentally resolve the parenting dilemmas faced by rural families. Given China’s curr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model is likely to persist in rural areas for some time.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harness the collective power of families, schools, communities, and the state. By adopting a systematic approach, we can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as much as possible, ensuring that rural children can still grow up healthy under this parenting model.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Left-behind Children; Social System; Subject of Education